

“实”处入手展现新风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 许安文

今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贵州考察时关于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推进红色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党史部门要深学细悟,“干”字当头抓落实,“实”处入手展现新风采。

一、坚持政治引领,提升党史工作方向力

政治属性是党史工作的根本属性,党史姓党是党史工作的根本要求。党史部门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突出政治引领,增强政治定力,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一,持续深入学习。为党撰修“红色家谱”是党史部门的重要职责。党史部门务必始终坚持“党史姓党、党史为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等,教育引导党史干部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肩负起党史工作的光荣使命。

第二,坚定服务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工作是党的全局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党史工作才能充满生机活力。党史部门要自觉在党史工作中恪守政治纪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以“三个历史决议”为准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关于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实事求是地反映和阐述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坚决避免出现“低级红”“高级黑”问题。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党史研究与党委、政府发展战略、中心任务结合起来,做到党有所需、史有所为,实现党史事业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同向同心同向、同频共振。

二、坚持精编细研,提升党史咨政专业力

“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习近平总书记 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发展”。党史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把党史研究任务抓好,精编细研,不断提升党史研究的咨政服务能力。

第一,强化资料征集。党史资料是

记录和反映历史活动、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能否做好,直接关系到党委、政府中心大局服务能力的强弱。要突出“历史”“红色文化”重点,落实好史料征集联动机制,深入挖掘、规范征集党史资料。持续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时段的历史资料征编,丰富各个时期党史资料。常规推进《中共黔东南州委执政纪要》、州委大事记等资料征集和编纂工作,准确记录党的历史,夯实党史工作史料基础,为纵深推进黔东南州红色文化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第二,提升资政能力。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建设“桥头堡”等州委、州政府中心工作 and 全州民生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努力提升资政服务能力。今年重点要围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系列党史专题研究。积极申报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宣传引导项目,认真抓好省委党史研究室重点资政调研课题的调查研究,指导县(市)完成年度课题调研任务,努力转化调查研究成果,不断提升党史研究为中心大局服务的“含金量”。

三、坚持化风育人,提升党史宣传影响力

存史资政育人是党史工作的职责所在。红色资源是我们党百年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黔东南州红色资源丰富,全州有7个革命老区县(市),革命遗址343处,州内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处、省级17处、州级4处、县级16处,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1处、省级7处,还涌现出中国工人运动先驱龙大道、中国共青团重要创始人周达文、红军大管家关国上杨至成等一批革命杰出人物……这些红色资源,带给我们思想启迪和精神滋养,在新征程上焕发出其时代光彩。党史部门要把这些红色资源作为党员教育的生动教材,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场地、革命遗址遗迹、纪念馆馆等教育基地的现场教育作用,化风育人,着力提升党史宣传教育的影响力。

第一,筑牢支撑点,让党史宣传教育有形。全州上下统筹联动,形成一盘棋,依托州内的黎平会议会址、中央军委纵队黎平驻地旧址、榕江红七军军部旧址以及杨至成将军纪念馆、锦屏龙大道故

居陈列馆、红七军历史陈列馆等,因地制宜丰富历史展陈展馆内容,着力打造红色教育矩阵,提升党史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借助革命遗址遗迹、红色文化场馆等平台,重点宣传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英勇奋斗和付出的巨大牺牲,宣传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光辉业绩,宣传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宣传不同历史时期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让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党史、了解党史,切实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

第二,抓实需求点,让党史宣传教育有味。党史部门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强化与其他部门协作攻坚,配合州、县两级党校,按照“一个基地、一段故事、一门课程”的思路,精准对接党员需求,集中收集整理一批本土红色人物、红色文化、历史事件等革命资料,整理一批生动形象的革命历史故事等,精心开发本土红色教育课程,着力打造“红色课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重温红色经典中寻求理想之光,让党员在实景实境中接受沉浸式教育,赓续红色血脉,立足岗位干事创业。

第三,找准关键点,让党史宣传教育有效。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的核心作用,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等重点内容,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党建工作、红色文化场地、革命纪念馆等教育阵地相融合互推进。坚持以党支部为单位,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邀请老党员、劳动模范和红色基地讲解员现场讲授,开展“五老”讲党史等活动,用身边榜样教育身边人,引导党员干部汲取“红色营养”,深切领悟初心、深刻启迪思想,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文化自信和发展信心决心。充分发挥好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在党史宣传教育中的作用,让党史宣传教育精彩纷呈、取得实效。

四、坚持保护开发,提升党史融合发展力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强调,“对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对革命战争时期留下的红色旧址,要加强系统性保护”。这为我们做好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和传承利用工作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近年来,我州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弘扬和开发利用工作,从“十三五”开始,就开发红军长征途经12个县的红色旅游景点,形成以“红色文化+康养旅游”“红色文化+苗族文化+名人故居”“红色文化+侗族文化+自然生态”“红色黎明,伟大转折起点”为主题的多条红色旅游精品线,为助推全州旅游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下步工作中,党史部门要立足单位职责,写好“党史融合”发展文章。

第一,密切配合抓推进。紧紧抓住国发〔2022〕2号和黔府发〔2022〕7号文件的历史机遇,配合文旅和文物部门,深入发掘红色资源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价值,充分发挥革命遗址的教育功能,切实抓好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把红色故事讲述好,把红色旅游开发好,把红色精神弘扬好。配合组织、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以美丽乡村示范建设为契机,整合资源,对县(市)革命遗址遗迹和纪念馆建设等进行修缮维护,让人民群众在畅享“诗和远方”的美好旅程中体味红色文化之韵。配合州人大、文旅、文物等部门,制定并严格执行革命遗址保护条例,将革命遗址保护开发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管理。

第二,深度融合谋发展。会同有关部门科学编制规划,将红色文化与旅游开发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规划、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和政策文件中,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规划体系。会同文旅等部门一起,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用好自然珍宝和文化瑰宝,积极探索“红色文化+”模式,将红色文化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例如,可推出“红色+家庭亲子游”,弘扬红色家风,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推出“红色+团建游”,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培育团结友善的工作氛围;推出“红色+康养养生游”,弘扬红色体育精神,引导人们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出“红色+节庆游”,增强红色文化仪式感,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

(作者单位: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

学思践悟

“两个结合”赋能当代文艺作品创作

□ 胡光典

文艺作品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必须要与社会的现状相结合才能具有和社会共鸣的时代性,才能具有感人心扉的号召力。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作品硕果累累,而文艺创作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两个结合”的指导理论占据着核心地位。

自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肩负起领导民族复兴的重任以来,中国的文艺创作就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开启了新的篇章。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指导下,在中国近代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中,文艺作品逐步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紧密相连、与中华民族的奋勇抗争同频共振、与工农兵的切身实际血脉相通,以此汲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在时代浪潮中持续书写着中华民族在文艺领域的壮丽篇章。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揭示的文艺作品要“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正是长期围绕“两个结合”的指导思想,使得近代以来中国文艺作品不断推陈出新,各类文艺形式蓬勃发展,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新颖的艺术表达,描绘出中华大地的万象更新。这些锚定“两个结合”理论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在形式上百花齐放、在时间上串联古今,充分展现出了“第二个结合”理论指导下在文艺作品创作中的多层次实践样态。

在“第二个结合”为理论指引下,音乐创作领域上实现了中华传统韵律与社会时代旋律的交融。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第二个结合”作为文艺创作的灵感指导始终贯穿其中,并诞生出传统韵律与时代旋律融合的、呈现独特风貌的音乐作品。就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以陕北民歌为基础,旋律采用了陕北地区的五声音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歌曲,使得人们在欣赏时能够体会到陕北人民精神上的高亢、生活上的纯真。在基于陕北民歌的根骨之上,是文艺创作的二

次表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在后续的发展中更是诞生出了西洋管弦乐与中华传统乐器相结合的合奏版本。西洋管弦乐的加入,使得曲调中的大调和中低音旋律得以补偿,在最后的呈现中出现了西洋乐器与中华传统乐器的同频共振。而从曲调的婉转曲折中,则可窥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前奏的民族乐器的委婉抒情就如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有着多次失败后的困惑;但后续随着弦乐在音律上的扬起,仿佛不屈的中国人民又一次激发出反抗的昂扬热情,爆发了五四运动,也正是这一段中,西方乐器逐渐加入演奏并与中国传统乐器形成交相辉映,如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马克思主义正式在中国开始传播;后续的演奏中,中西乐器的交相辉映以及大调为主的音律则是象征着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后,成功的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拯救民族、挽救国家的正确道路,并在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将音乐创作与时代旋律、人民生活的融合不仅仅是音乐层面上的创新,更是思想文化领域“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这种结合使得音乐作品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能够紧跟时代步伐,传达出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精神诉求,从而在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深度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第二个结合”为理论指引下,戏剧舞台领域上实现了古今中外艺术形式与时代故事的碰撞与共生。以《智取威虎山》为例,这部现代京剧在背景上立足于近代的东北剿匪,在创作中实现了传统京剧的基础上的大胆创新。在表演形式上、唱腔设计上以及舞台布景等方面都实现了对于传统中华戏剧的创新突破。这样不拘泥于旧有框架的创新实现了传统京剧艺术与时代题材在文艺创作上的有机结合,让古老的京剧在当代的文艺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此外,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则以中西艺术融合的形式实现文艺创作上“两个结合”的杰出代表。从艺术形式上看,它将西方芭蕾舞的优雅舞姿与中国民族舞蹈的刚健有力相结合。在舞蹈动

作设计中,融入了中国武术、民间舞蹈的动作元素。音乐创作上,《红色娘子军》以海南民间音乐为素材,又融入了交响乐,使得旋律中既有海南音乐的优美旋律,又增强了音乐的层次感和戏剧性。剧情上,《红色娘子军》以红色娘子军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为蓝本,将西方芭蕾舞的叙事方式与中国革命题材相融合,成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经典之作。可见在戏剧舞台的领域“两个结合”的成效斐然,不仅拓宽了戏剧创作边界,更以文艺之力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滋养当代精神传播。文艺工作者们应持续深挖“两个结合”的理论价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富矿,从而创作出更多激荡时代、灼照心灵的佳作,从而推动中国的文艺创作迈向新高度。

在“两个结合”的理论指引下,电影创作领域上实现了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价值表达的深度融合。纵观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两个结合”始终作为文艺创作核心理念贯穿其间,其中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及其续作《哪吒之魔童闹海》正是传统神话主题与当代精神诉求相结合的典范。《哪吒》系列电影以《封神演义》的古典叙事为基底,其核心矛盾既保留了传统神话中天命与抗争的命题,又注入了新时代青年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刻思考。在传统叙事框架的根脉之上,《哪吒》系列电影进行了更具时代特征的创新演绎,既延续了传统戏曲中正邪相生的哲学思辨,又暗合当代青年冲破身份桎梏、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诉求。影片将古典水墨美学与3D数字技术有机融合,既保留了传统壁画中天宫意象的飘灵动逸,又通过特效技术构建出具有别具特色的玄幻空间。传统水墨笔触与数字技术在银幕上的交相辉映,既展现了东方美学的当代生命力,也昭示着科技创新对文化表达的赋能作用。这种艺术创作层面的双重融合,正是“两个结合”在电影领域的生动实践,也是在文化传承与创新表达之间构建起动态平衡。

明晰“两个结合”对当代文艺作品创作的重要意义后,进而深入探究其对文艺作品创作新动能的赋能就尤为关

键。“两个结合”对于文艺创作能通过思想升华与价值引领层面,为作品注入深度内涵;借由艺术创新与审美突破,赋予作品独特魅力;再到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拓展作品影响力边界对文艺创作进行赋能。

“两个结合”为当代文艺作品创作带来了思想升华与价值引领的新动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使文艺作品在思想深度上有了质的飞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犹如一片优质的文化宝矿等待开发,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传统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并融入到当代的文艺创作中。这样的结合能够打破文艺作品单纯娱乐化、浅表化的桎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融,为作品内核注入深沉力量。

“两个结合”也推动了当代文艺作品创作在艺术创新与审美突破方面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为现代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但是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是摆在文艺工作者们面前的一道难题,而“两个结合”的理论指引就为化解这样的难题提供了方法论。即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一步激活传统文化中那些代表民族世代智慧,使民族得以生存、延续的精神命脉。

“两个结合”还在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方面为当代文艺作品赋予了强大动能。“两个结合”使文艺作品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桥梁,各类文艺作品让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式走进当代人的生活,实现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国际传播领域,这些结合了传统文化元素的文艺作品更是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以独特的文化标识和艺术价值,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障碍,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黔东南村寨珍藏了丰富的民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被称为民族文化博物馆。“计划生育第一村”从江县占里村,将传统侗族“款约”与新时期法治建设有机结合,走出一条民族特色基层治理新路子,先后荣获“中国人口文化第一村”“中国传统村落”等称号,2018年被司法部、民政部表彰为第七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一个深山里的侗寨,成为中国基层治理典型范式,主要经验有几点:

一、以目标价值导向确立村寨规矩

占里自建寨始,确定了明确的价值目标,即建设和谐村寨。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村寨长久续存和薪火相传。从历史资料观察,黔东南世居民族迁徙大致有几种原因:一是躲避战乱;二是原祖居地人口规模扩大,需开垦新的处女地;三是零星的迁徙,或受封建势力压迫,或朝廷发配迁徙边疆,或追求财富大冒险,到新世界开创新基业。第一代搬到占里的吴公等寨佬反思迁徙原因,率先提出控制人口、节制生育的主张。避免因粮食供给不出,出现饥荒、偷盗、抢劫等不良社会现象,影响族群和谐和社会稳定。占里人生活愿景和目标追求,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和文化价值理念。

二、以乡约制度为规范建立村寨和谐秩序

占里确定了让后世子孙永续生存发展的目标,必然要建立具有一定强制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即约定俗成的乡约制度。占里传统乡村治理文化演变可归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歌谣和语言为基础内涵的自然治理阶段。语言反映思想,体现了人们的思想价值内涵与行为边界。没有文字的民族,以语言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塑造对世界的愿景。最早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和社会治理措施的实施主要通过语言来完成。占里祖先立下寨规:一对夫妇如有50石稻田的可以养两个孩子,有30石稻田的只准养一个孩子。隆重的节日以侗族大歌为训,教导子孙:“崽多无田种,女多无银两”“一棵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这些朴素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矩,催生了占里独特的“适度人口”理念,建立起人口控制的系统工程,一直沿袭至今。现在,占里人把老祖先的规矩,刻成木匾悬挂于村头溪口的风雨桥长廊上,供人们随时阅读谨记;第二阶段,款约文字具象化,以汉文刻碑纪事宣教。以语言为载体的村寨族群规矩,核心价值得以确定,但又无时不处于演绎或更替变化之中。以文字为载体的道德和乡约制度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自从侗家先分子习得汉字后,用汉字记录侗寨历史、乡风民俗,以及侗族古歌、民间歌谣等民间文化,极具紧迫性。占里人将吴公等寨佬所立规矩,从侗语翻译为汉字,刻石碑立于村寨小广场上,成为占里侗寨最为庄严的乡约制度。内容简约精要,计六条:1.一对夫妻生育一对子女;2.严禁滥伐山林树木;3.严防山林寨火;4.严禁偷盗;5.严禁赌博吸毒;6.严禁行贿受贿,公正断事。对相应的内容,占里以歌谣的形式进行解读和告诫。占里侗寨的规矩,与相邻侗寨议定的款约,一脉相承,相互贯通,共同约束村民的行为,成为侗寨最重要的法定规矩和道德规范;第三阶段,乡约与法治相融合,建立新型村规民约治理形态。根据吕思勉《中国通史·刑法》篇中说:“法律的来源有二:一为社会的风俗,二为国家对人民的要求。”国家或王朝制定法律的目的,总是适应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乡约同样要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体现了村落文化的演变。站在少数民族的角度,以占里侗寨等观察侗族款约的演进,也能够了解乡约治理的演进规律。起初的道德要求出于生活的需要,训词非常简约。随着侗族社会演进,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逐渐增多,侗族款约不断增多,并通过分类,遂成完整体系“侗族款约法”,是为侗族村寨治理的“基本大法”。对于重罪,一般会处以比较重的惩罚;对于罪行较轻的,一般处以罚款等,或令其敲锣喊寨,表示悔过。

影响占里侗寨社会治理形态的款约法,又是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呢?2015年9月,占里村以祖先订立的六条村规为基础,依照国家有关法律及政策,结合占里村实际,在村规中加入了环境保护、婚姻家庭、社会治安等相关内容,新制定的《村规民约》共计47条,主要是将过去对民间侗寨影响较大的处罚措施进行了分解细化,将违法犯罪的,处以“三个一百二”(120斤猪肉、120斤大米、120斤米酒),其他则进行了细分,视不同情况,分别处以“三个66”“三个33”“三个12”等。将古老的乡约制度与现代法治规范融合,实现了德治、法治和自治相融合的“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体现了侗寨民间治理文化的开放性,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

三、以传统民间宣教仪式确立法制威严

法律大多依靠一定强制约束力的处罚形式得以维持。对于自然侗寨而言,靠什么维持款约形式的社会治理呢?一是将款约制度上升为公众意志。由寨佬议定和确立的规矩,由个人意志立法或上升为族群或全体村民共同的意志。这是古代族群社会通用的方式。如侗寨萨玛节“祭萨”活动,歌师以演唱方式,把村寨规矩由萨玛说出,演变为全体村民的意志。在黔东南村寨治理中,无论侗族款约或苗族议榔,一旦族群大会确定下来,通过祭祀天地和神灵,将族群意志转化为公共意志,强化其威严,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效果;二是民间歌谣教育,让侗寨款约制度和古老规矩深入人心。侗族乐教文化在社会发展演化中,占据极端重要的位置。融入歌谣,通过歌师演唱,教化村民,或节日举行庆典,通过歌师或村民演唱款约辞条,达到普及道德法制的目的。锦屏瑶白每年六月六举行的歌会,形式极威严,包含了侗寨款约教育的内涵。占里所在的南侗地区,鼓楼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场所。侗寨还有鼓楼议事传统,相当于族群社会的民主制度。对违反款约的行为和人事,也会在鼓楼决议,并进行相应惩罚,增强了款约制度的严肃性;三是形成独特的款约盟誓传统仪式。由于山川阻隔,独居一隅,占里款约治理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形式:盟誓石——占里的镇寨之宝。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和八月初一,都要举行盟誓仪式。在仪式上,青年男女发誓词,内容包括:计生、生态、安全、禁偷盗、禁赌毒、廉政等占里“六条款约”,是为占里和谐社会建设的法制保障;四是严肃处理违款者,形成规范的惩戒教育制度。法制的形成和完善包括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法律条文的完备;一个是与之配套惩戒措施完善的。中国古代的法律非常讲究对违法者的处罚。鉴于苗侗等少数民族族群聚居地,由于社会发展演进比较缓慢,对违反款约和概规的处罚,还保留着原始、古朴的风俗特征。维护传统侗寨安宁的古老款约制度,曾经包含非常严厉的古典礼典内容,已经被现代法治文化所扬弃和取代。

占里在和谐村寨建设中,明确把以款约为基础的传统乡约制度摆在重要地位,并不断融合国家法条制案,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内容,转化为新的文化风俗,体现了占里侗寨治理文化的包容性,在乡村振兴中展现了独特范式,具有可以资鉴的意义和作用。

(杨平皎系中共从江县党校讲师,李家禄系中共黔东南州委党校教授)

从占里乡约看侗寨乡村治理文化的演变

□ 杨平皎 李家禄